

顧準著作的流布

◎ 羅銀勝

顧準是中國前改革時期的思想家。今年適逢顧準誕辰九十周年，謹以此文作為小小的紀念。

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不久，有幸結識了知名學者、顧準的胞弟陳敏之先生，即在他的精心指導下，開始曲折而漫長的顧準研究工作，迄今忽忽已近二十載。對於顧準著作的流布情況，有所耳聞目睹。筆者認為，顧準著作的流布，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人民思想解放的艱辛進程。不忘這段歷史，也算是以史為鑒吧。

顧準自幼自學成才，很快成為立信會計事業的台柱，深得傑出的會計專家、教育家潘序倫的信任；顧準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領導了地下黨的職委、文委工作，立信成為他革命生涯的起點；顧準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市首任財政局局長，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顧準後來在令人難以想象的逆境中，從事學術研究，他對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哲學、經濟、思想的探索，具有里程碑式的貢獻，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際、明內外之勢、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眾所周知，顧準是以研究會計成名的，早在十九歲，他就以一部《銀行會計》（商務印書館出版）得風氣之先，從而獨步學界。他是一個會計學家，但同時又是一個共產黨人。從事會計事業，當時在他不過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和從事革命活動的職業掩護，並不是他的人生目的。他的人生目的是實現革命理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此目標，他不惜放棄優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

「反右」鬥爭中，顧準立馬中箭。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在孫治方的關心下，顧準於1962年5月，再度進入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孫治方非常歡迎顧準的到來，將他安排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室，為他提供十分優越的科研條件。

孫治方是一位懂行的、知人善任的專家型領導，所以他為顧準提供看來優越的科研環境和工作環境，並不出於私人的感情，而是他懂得顧準的價值，顧準思想的重要性。因此，有人在「文革」中也說顧準在經濟所「心情舒暢」，確亦如此。顧準給自己提出的目標是：「埋頭工作，決心在會計研究上作出應有的貢獻」，同時，「想利用這個環境來繼續自己的探索，但是這是一個人進行的探索，探索不成功，不想去影響別人」，並要「在經濟研究上作『芻蕘之獻』」（均見《顧準自述》，第275-276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因此，顧準重返經濟所的兩年多時間，並未將研究的範圍局限於會計研究，還作了大量經濟研究和翻譯工作。他在此期間留下了會計研究方面的不少著述，囿於當時的條件，並未公開出版。

當時，顧準到上海、東北調查研究，寫出《會計原理》和《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兩部著作。於此可見他對會計事業在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要性的重視。他當然決不會認為會計是一種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純屬技術性的工作，因為他深知一個現代企業，如果沒有一種科學工具——現代會計來記錄、核算、分析企業的全部經濟活動和經濟業務上的往來關係，這個企業的經營管理除了一團糟的結局以外，不可能會有別的甚麼結果。

顧準的《會計原理》是一部殘卷。顧準逝世後留下的編寫大綱表明：原計劃欲寫七篇，這只是其中的第一篇。1965年顧準被第二次錯誤地戴上右派帽子（也是新中國成立後作者第三次受到不公正、不應有的錯誤的打擊），接踵而來的是震天撼地史無前例的「文革」，他連工作權利也被剝奪了，自然不可能續其成。1974年12月，顧準在北京病逝，他的弟弟陳敏之在整理他的遺稿時，發現了《會計原理》的手稿和《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的列印稿。

對於胞兄的這兩部會計學遺著，陳敏之當然要盡力爭取早日出版。然而在那個暗無天日的荒誕歲月，陳敏之的努力終歸無效，這也毫不奇怪。一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情況才有轉機。《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2年5月出版，發行了二萬七千冊。

然而《會計原理》的出版卻充滿艱辛，用陳敏之的話說，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事情還得從1976年說起：那年人怨天怒，中國北方大鬧地震，孫冶方夫婦到滬暫住在老朋友陳修良寓中，陳敏之聞之晤面。不久，「四人幫」垮台。孫冶方聽說顧準有一部《會計原理》還未出版，就熱情地相托於姚鼐（孫冶方建國後擔任上海財經學院首任院長時，後者為其副手），姚鼐受託後找到洪澤（當時在上海市宣傳口工作），洪澤則把顧準的《會計原理》手稿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歐陽仲華承辦。說起來歐陽仲華與顧準多少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同為立信校友，只不過顧準早就離開立信，叱吒風雲於疆場時，歐陽大概還少不更事。即便他孤陋寡聞，對顧準的名字終有耳食吧？話說歐陽拿到手稿後，精心拜讀，一讀再讀，時間就在他的仔細閱讀下無聲無息地流淌著，他的「水磨」功夫著實堪稱一絕。別人不著急不要緊，作為顧準兄弟的陳敏之摒擋一切，欲向歐陽求教。歐陽其時不知出任何官職（後來「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有幸，它的總編輯一度曾由其擔綱），他對求教者打起了「官腔」，意謂顧準的書內容陳舊，辭匯與現時不相稱云云……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陳敏之當即取回書稿，拂袖而走。

儘管碰壁多多，陳敏之還是於心不甘，在他工作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裏，有一位同事名叫吳逸，與時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的許毅（他也是立信老校友，與顧準在華東局財委會共過事。我在從事《顧準傳》的寫作時，曾採訪過他）比較熟悉。一次乘許毅來滬出差的機會，陳敏之就由吳逸引見許毅，拜訪是在位於外灘的新城飯店進行的，會見雖然是禮節性的，氣氛顯然是熱烈的，兩人相見恨晚。說起顧準的《會計原理》一書，許毅拍著胸脯，打包票地答應，由他帶回去聯繫出版社在京出版。陳敏之當然感激不盡，心想終於遇到了知音。約莫過了年把光景，顧準的《會計原理》確實於1983年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這是當時唯一隸屬於財政部的中央級出版社）。

此書郵寄到陳敏之手中時，他感到一頭霧水，很是納悶，以為拿到了一本「非法出版物」，因為這本小三十二開的書籍表面看來頗為「舒朗簡潔」：既無出版社署名，也無版權頁，當然也不會有書號、定價之類的東西。其原因是甚麼，陳敏之至今也沒鬧明白，他也不敢妄自揣測，不過他「仍然很感謝一切曾經為出版此書做過努力的朋友」。此書當時只印了一千

冊，其中二百冊由陳敏之分贈親朋好友，餘下的八百冊，蒙出版社的美意，通知讓他自行出售，書款抵充稿費。陳敏之因當時工作較忙，無暇顧及此事，只好委託他的老朋友、時任上海會計學會秘書長陸修淵（原立信校友）代為辦理，售書所得八百元請他悉數匯交中國財經出版社。事後，陳敏之曾幾次寫信給許毅，打聽原委。許毅也有一肚子的苦水，他回答說，經向財政部副部長陳如龍同志請示，顧準的《會計原理》的出版，只能做到這個份上。

後來經過再三努力，《會計原理》收入【新編立信會計叢書】，於1984年由上海的知識出版社（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的前身）正式公開出版，第一版印數達31000冊。出版社決定的印數如此巨大，當然不會是隨意的。其時已屆耄耋的潘序倫先生在為此書寫的序言中作出了如下肯定的評價：「這篇遺著雖屬殘卷，仍可獨立成篇，編寫方法也與眾不同，以他一貫的嚴謹學風，運用馬列主義觀點，層層剖析，逐步深入，獨創一格而不拘泥於習俗。例如：主張利息不應列入成本，應從利潤中支出；用數理矩陣方式，來說明複式簿記恆等原理；對借貸記賬法和收付記賬法問題，提出新的見解……許多有關會計理論和實務問題，均具有其獨到的識見。」

這位中國現代會計的泰斗，還滿懷深情說：「我看了顧準同志的這篇遺著，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又引起了我對他的懷念和無限惋惜之情。顧準同志在現代會計界中，可稱為一個難得的人才。」「但他『志不在此』，於1940年毅然拋棄優厚的待遇和都市生活，離開上海奔赴解放區，為祖國革命事業作出卓越的貢獻……」

1986年《立信會計選輯》第四輯（知識出版社出版）以《讀顧準同志遺著〈會計原理〉的啟示和體會》為題，輯錄了我國部分知名的會計學家對此書的評價。他們認為：「書中許多觀點、名詞、提法，都具有科學性。如複式記賬法是一種純粹數學方法，方法本身並不包含甚麼階級性的因素在內」；「對於會計學的性質、主體、客體（對象）、作用、任務、方法和組織，進行了全面和正確的闡述。尤其書中有不少地方，衝破了當時蘇聯教材的束縛，密切結合我國的實際，提出了精闢的見解」（管錦康）；「這本遺作確有獨特創見、獨特風格」，「例如會計主體這個詞就是一般書籍中所未見過的，用數學中的矩陣來解釋複式記賬法，也是獨創的」（王文彬）；「顧準同志也頗重視研究蘇聯的會計理論和方法，但決不生搬硬套」（梅汝和）；「如果我國的一些會計學者或會計工作者，對此（按：指複式記賬原理）早有足夠理解的話，那麼，近二十年來我國會計界有關記賬方法的爭論，就應迎刃而解了」；「複式記賬法是一種數學方法，複式記賬法的記賬規則就是矩陣規則，不僅解決了長期糾纏不清的問題，也開創了我國以數學方法來解決會計問題（包括理論與實務）的先導」（徐之河、黃履申）；「這本著作不僅是一般初學者的良好讀物，也是我們專業理論工作者的學習榜樣」（李鴻壽）。

二

如果說顧準遺著《會計原理》的出版，歷經戲劇性的磨難，那麼他的另一部專著《希臘城邦制度》的問世顯得「平淡無奇」了。顧準在世時，曾與吳敬璉一起在河南「五七」幹校勞改。期間他們相互砥礪，聊天是其中的方式之一。顧準對吳敬璉說過，要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學習西方的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對整個人類歷史作一番梳理。然後再回過頭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和探索人類的未來發展，就容易看得清楚。於是，他們兩人決定利用難得的時機（此時正好是林彪黜事件以後，政治空氣比較鬆動的空隙），從希臘史開始他們的歷史漫遊。吳敬璉後來回憶道：通過與顧準的切磋，「我看到了所謂『儒表法裏』

的專制主義思想在中國在政治思想中多麼源遠流長。這樣，對於探索希臘城邦民主制的源頭的興趣也就更大了。」（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錄》，第356頁）1972年顧準返京後，繼續抱病進行這一探索，撰寫了許多讀書筆記，其中就有《希臘城邦制度》。

在《希臘城邦制度》中，顧準從希臘城邦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最後形成過程中，探索西方文明的源流。他並不囿於史實的一般敘述，而是從文明起源這一廣泛領域，對西方歷史、古希臘和古代中國作對比研究，從中提出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問題，這一可貴的嘗試是極有現實意義的。該書分六章，顧準原擬寫就後再修訂，但不幸未及完稿，便溘然辭世。

根據顧準的遺囑，陳敏之將這份遺稿檢出送給他的知己吳敬璉保存，吳敬璉與顧準誼在亦師亦友，顧準將這份文稿託付給吳敬璉是寄寓無限的期望。

這份筆記，在顧準生前，陳敏之還沒有讀過，很想讀一遍，乃商得吳敬璉的同意，拿到了文稿，讀了一遍。讀後深感自己學力不逮，有必要以後仔細研究，隱身就重抄了一份，這樣既可供自己今後繼續學習西方史時隨時翻閱，同時又為後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陳敏之認為：「希臘史研究，不過是五哥十年研究計劃中的一部分，一個開端。他曾對我說到過，打算用十年時間，通盤比較徹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後是）中國的歷史，並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達成他對歷史未來的『探索』。如果天假以餘年，可以期望十年之後，會能得到某種成果。可是，誰能意料得到，『橫逆』的襲擊，竟來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這個研究計劃還在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夭折了！然而，幸運的是他還給我們留下了這份筆記，雖然連這份筆記也還是一份未完稿。」（《希臘城邦制度》後記，作於1975年）

陳敏之讀了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以後，無時不刻一直在惦記著它的命運，在顧準逝世的第二年即1975年他就說過這樣的話——

「這份筆記今後的命運怎樣，我無法預測和斷定。也許它會象歷史上並不鮮見的許多先人和他們的著作一樣，埋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也許它可能在某種歷史條件下面，居然還能被人所重視。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經開始的這種歷史研究是否有人繼續下去（我當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繼續下去），因為，五哥從事這種歷史研究，他的本來的目的並不在研究歷史。我矚目於未來……」（見陳敏之為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所作的《後記》）

對這部極富創見的著作，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的吳敬璉，則交給院內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該社的國際問題編輯室收到書稿後，二話沒說，立即投入精兵強將抓緊出版。期間編輯依據手稿對照陳敏之的整理稿作了精心校勘，將稿中的旁注、另頁，也酌情編入正文或註釋中；對稿中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專用名詞和中文引文，竭盡所能進行了校核……這樣，使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打造成為精品。1982年，該書順利問世。出版後，好評如潮，被認為是研究古希臘歷史的拓荒性著作。

在此前後，顧準翻譯的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和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的《經濟學論文集》，分別在1979年與198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不過，前者署名為「絳楓」，這是顧準早年曾用過的一個筆名。

三

顧準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當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本書的出版同樣費盡周折，陳敏之為之心力憔悴。

顧準生前命不好，一生坎坷。死後命仍不好，真可謂命運多蹇。這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從整理成書到出版問世，歷時十八個春秋，其間經歷了幾多波折和艱辛，最後仍未能首先在大陸出版。

顧準生前根本沒有想到過要出版這本書，也沒有想到過會出版這本書，因為他寫該書各篇時，純粹為了滿足弟弟陳敏之個人的要求，或者是答覆弟弟的提問，如關於西方史、騎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弟弟討論甚至爭論某一問題，如關於民主問題的各篇以及關於哲學問題；或者是對弟弟的筆記所寫的讀後感，如關於老子、孔子、韓非各篇。其中只有〈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一篇，是應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李少甫（立信同人，進社成員）之請所寫。這些看似隨手寫來的筆記、讀後感，決不是信手拈來之物，而是作者多少年來的積累，凝結著作者多年來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勞動。有誰能隨手寫出這樣的筆記？

從1977年開始，陳敏之把顧準寄來的那些筆記，稍加整理分類，重新抄寫了一遍，裝訂成冊。這些筆記，用的是當時廉價的極薄的信箋紙，字又寫得很小，取其輕而容量大，然而經不起翻閱。重新抄寫一份，一方面是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方面也是為了自己翻閱的方便，原沒有存甚麼出版的奢望。

1980年初，在北京舉行顧準和他妻子汪璧的追悼會之後，一些老朋友曾經議論過為他出一本集子，以志紀念。然而因為事非容易，一時難以實現，也就擱下了下來。

根據陳敏之的回憶，顧準的這部文稿不會晚於1984年年底以前，通過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即在文化部系統工作的周靜）之手，交到了享有盛譽的三聯書店手裏。負責審讀的編者讀了以後，寫道：「深感作者知識淵博，很有識見。也許是因為兄弟之間的探討問題，直抒胸臆，不諱權威……此文寫於那種不講學術，不講科學的時代，實乃不凡之作。」當時這家出版社的負責人是小有名氣的沈昌文先生。沈先生也認為該出版社「今後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對於各色各種的單本兒的『奇書』始終要給予支援。……顧準之作，我想是屬於『奇書』之列的」（陳敏之《我與顧準》，第7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話雖如此，不久之後，顧準之作仍通過周靜這位老朋友，無聲地退給了陳敏之。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沈昌文此公頗有自知之明的風範，十多年彈指一揮，他在風靡知識界的《閣樓人語》一書坦承：「……我是一個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我當年在編發顧準前輩的文章時，就有過應當允許『晚著造反』這念頭，但臨了還是扣了一些不敢發，更不用說別的稿件了（感謝後來有同行大顧準文集印成書了）。所以，對於在《讀書》工作這些年。我所慚愧的只是，許多事沒有按列寧的教導認真去做。」（第36頁，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版）需要補充的是，當年《讀書》刊登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之一〈科學與民主〉。同時《讀書》在1984年第7期發表了陳敏之的〈顧準與會計學〉一文。

1987年12月，一位年輕的朋友陳申申（陳同生之子）找到陳敏之，他在讀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原稿以後，主動地非常熱忱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寫信推薦這本書。他在信中寫道：「顧準同志，作為老一輩共產黨員中的理論家，他所留下的文字雖然不多，但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啟示卻是很少人能與之相比的。他的理論貢獻是歷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論上最重要、同時又是最會混淆不清的地方，給我們留下了極可寶貴的意見。若不是得益於他的學問，他的精闢的見解，他的清晰明快的語言，我們至今對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還會在迷霧之中。」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在認真審讀這部文稿以後，反應也是十分積極的，1988年6月，編者提出了以下意見：「全稿文字凝煉曉暢，筆鋒犀利，激蕩人心，讀來愛不釋手。」認為「作者忠於革命，熱愛人民，他寫的文稿出於憂國憂民之心，具有嚴肅的科學態度，從觀點到語言都不超出學術範圍」，因此可以出版。認為「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萬馬齊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這一系列真知灼見，他的智慧和勇氣實在令人欽佩」（陳敏之《我與顧準》，第73頁），云云。不久，文稿的出版已成定局，是年8月陳敏之為此書寫了一篇序言。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校讀了清樣，滿以為不需多久，就可以看到樣書。然而，誰能意料得到，1989年春，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波，使這本書終於流產。這一擱，又是整整三年頭。

既然結成集子出版，需要為之題一個書名。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是由陳敏之提出、在同時提出的五六個書名中經過反覆推敲、斟酌最後選定的。他曾經想採用《娜拉出走以後》為書名，後來徵求過王元化同志的意見，他也認為還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好，這個比較嚴肅的書名符合書的內容，不會產生誤解，就這樣定下來了。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大體上體現了該書各篇蘊含著的主要精神和思想。不僅如此，也可以認為它概括和如實地描繪了顧準一生走過來的路。其實，也不光是他一個人是如此。所有和他同時代的人，不是都從「30-40年代的戰爭與革命，某種遠大的理想——超過抗日的理想，以及由於這種理想而引起的狂熱，宗教式的狂熱」（顧準語）走過來的嗎？不是都經歷過50年代「一天等於二十年」那狂飆式的革命浪漫主義嗎？不是都需要從理想主義轉到經驗主義嗎？所不同的是，作者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從這種想象力出發，固然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跡，卻不能解決『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因而，早在將近二十年以前就提出現在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甚麼，哪些沒有解決，哪些是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同上）。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通過陳昕的關係，轉給香港三聯書店，作為思想者文叢之一，於1992年正式出版。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港版抽下了〈民主與「終極目的」〉和〈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的篇目。不過，陳敏之仍然感慨萬分：「現在，歷經艱辛，終於見到了天日。魯迅在為〈白莽作《孩兒塔》序〉中曾說過：『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更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這些年來，我手裏捏著的不是一團火，而是一團熊熊烈火。現在，當我手裏捧著這本裝幀樸素的遺著，終於見到了先兄的遺墨。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裏感到的欣慰是難以言喻的；先兄若地下有知，可能會稍稍感到意外吧，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他為我寫的這些『筆記』，居然還會出版……」

四

1980年2月，為顧準、汪璧召開追悼會以後，也就是前敘的陳敏之和一些老同志，曾經有過為顧準出一本書（文集或紀念集）以資紀念的設想，他們為此一直在努力著。

陳敏之編輯的《顧準文集》有顧準與其弟在1973-1974兩年中的通信，它曾經以《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為書名出版過單行本的部分。然而有兩個不足：一是因為在香港出版，書價既貴，大陸能買到、看到此書的也不會太多；二是該書出版時，抽掉了兩篇文章，因而不是全豹。因為存在著這樣的不足，因此總想尋找機會予以補足。不過，更重要的是陳敏之認為，這些通信雖然是顧準寫給他個人的，但是，通信中所蘊含的這些學術思想不應當為他個人專

有，應當是屬於社會，因此有責任把它貢獻給這個社會，這個時代。

1993年12月陳敏之自北京回滬，除了趕寫出序言、編定目錄、整理文稿和辦理一些必要的編務上的事情外，著重的是要聯繫一家出版機構，以便能夠如我預期的趕在顧準去世二十周年（1994年12月）和八十歲誕辰（1995年）以前出版。

陳敏之聯繫了一家自費出版而著稱的學林出版社，雖說不上有甚麼關係，不過，談起來彼此也還不是十分生疏；有關出版的問題，沒有費多少唇舌，很快就簽了協定，並且按協定陳敏之支付了第一次款項。

事情辦得比陳敏之預料的還要順利，他當然十分高興。真如我國俗諺所說：不如意事常八九抑或是不是顧準的命不好。就在《顧準文集》書稿發排前夕，責任編輯歐陽文彬（這位資深編輯曾與陳敏之一起編過《韜奮選集》）突然給陳敏之打來電話，說以前在香港出版時抽掉的兩篇文章，這次也不能放進去。這是陳敏之沒有想到的，因為在簽出版協定、交付書稿時，他是交待清楚的。現在，既然有了異議，只能再磋商，看看能不能再取得一致。

於是陳敏之強支病體，趕到當時位於文廟的出版社。磋商中，時任出版社負責人的雷群明堅持這兩篇文章一定不能放進去，並表示希望我能諒解云云。話說到這個份兒上，陳敏之除了表示能理解之外，複能何言。不過，這一折騰，幾個月過去了，他不能不為找哪一家出版社和能否趕在1994年12月顧準去世二十周年之前出版而犯愁。

皇天不負有心人。具有俠義心腸的朋友，任何朝代、任何社會裏都有。顧準的戰友、知己王元化一直幫忙聯繫出版社，在他的牽線搭橋下，貴州人民出版社允諾出版《顧準文集》。這次幾乎沒有費一點周折，出版社馬上簽了協定，並落實了責任編輯楊建國。一如陳敏之所預期的，在1994年12月以前看到了樣書。原來陳敏之以為，在上海的出版社，許多事就近磋商、解決比較方便，因此，總不太願意找外地的，更不說遠在幾千里之外、交通還不能說很方便的貴州了。可是，事實糾正了他不符實際的觀念，真正的理解是可以超越重重關山的阻隔的。

1995年3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為顧準誕生八十周年和《顧準文集》的出版召開了紀念座談會，對顧準和他的學術思想作出了應有的評價。顧準生前對自己的榮譽毀譽，都已經完全置之度外，更不必說在他死後了。他只認定一條，為了追求真理，鍥而不捨。

顧準生前素有記日記的習慣，他去世後，遺留下的日記大部分保存在陳敏之手裏，小部分則在顧準的兒子高粱（顧南九）那裏。

《顧準文集》出版後，許多人都慨歎，作為思想家的顧準，生前留下的文字材料太少。許多文稿，都在那個嚴酷的年代被銷毀了。也有人想到了一個問題，這位不尋常的思想家，是否還留下了一些未曾發表過的文字？

1997年元月，陳敏之來北京後，丁東就這個問題討教了他，並問及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日記。陳敏之告訴丁東，顧準留下的日記有三本，一本於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寫於河南商城；一本於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寫於河南息縣東嶽和明港；一本於1972年10月13日至1974年10月15日寫於北京，從此他一病不起，直到1974年12月3日與世長辭。於是，丁東就產生了一個念頭，應當爭取讓顧準遺留下來的日記與廣大讀者見面。

當年3月，丁東遇見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編審黃德志女士。她正經營著該社所屬的一家書

店。她問丁東有甚麼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俱佳的書稿？丁東當時便談到《顧準日記》。她對顧準的道德文章十分欽佩。於是當下說定，由丁東找陳敏之先生聯繫書稿，由她聯繫出版發行事宜。陳敏之很快就把日記的複印件寄給了丁東。黃德志這邊卻不順利。這下子使丁東十分為難。這時，《百年潮》的副主編鄭海天先生又問丁東有甚麼好稿，就向他推薦了《顧準日記》，他們選發了三千多字。《天涯》的主編蔣子丹也問丁東有甚麼好稿，又為她選了一萬字。當時《天涯》的社長韓少功有意選發四、五萬字，丁東沒敢答應。他怕選得太多，書就沒有市場了。這時，丁東只好繼續與別的出版社聯繫，其間的坎坷一言難盡。最後，終於找到了經濟日報出版社。

與出版的艱難相比，編輯過程則幾乎是一路綠燈。李慎之先生中風住院，仍然抱病作序，忙了十幾天。王元化先生欣然命筆，題寫了書名，他還建議，要把顧準女兒的文章收入書中。陳敏之年事已高，他與丁東一起，捧著清樣，連著校了四次。書剛出來，他卻檢查出胃癌，經施行手術，安然無恙。

《顧準日記》出版後，雖然反響很好，但仍不是完璧。留存在高梁那裏的是顧準寫於1956年的中央黨校日記。承蒙高梁的美意，他把這本飽經滄桑的日記簿交給我，讓我寫作《顧準傳》時參考。後來我複製了一套，編輯《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時，選遍了其中幾篇，也算是首度問世。

《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是我應中國青年出版社之約選遍的一本顧準文選，它簡明扼要，基本上把顧準各個時期的代表作，都囊括進來。當時我的復旦同學、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輯李師東聽說我正在創作《顧準傳》，對顧準的情況多少有些了解，而他正在策劃《野百合花叢書》，於是他就約請我選遍一本顧準文選，我選十幾篇顧準的文章，並撰寫了約五萬多字的《顧準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作為導讀，書名定為《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於1999年1月出版。

後來又過了數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再次獨具膽識，於2002年1月編輯出版了《顧準文存》，一套四卷，包括《顧準文稿》、《顧準自述》、《顧準日記》、《顧準筆記》等，這是目前最為完整的顧準文集。對於出版社領導的遠見卓識，我想編者和讀者都心存感激。

顧準的思想可能會過時，顧準的精神永遠不會過時！但願顧準精神能夠薪火相傳，伴隨千千萬萬的中國知識份子邁向新的進程。

2005年5月20日

羅銀勝 傳記作家、人文學者。198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現在《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學報》編輯部工作。著有《顧準傳》（團結出版社）、《潘序倫傳》（立信會計出版社）、《才情人生喬冠華》（團結出版社）、《喬冠華畫傳》（作家出版社）、《楊絳傳》（文化藝術出版社）、《顧準畫傳》（團結出版社）、《顧準的最後二十年》（中國文史出版社）、《紅色外交家喬冠華的悲喜一生》（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編著《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中國青年出版社）、《顧準再思錄》（立信會計出版社）、《潘序倫教育思想和辦學實踐研究》（立信會計出版社）；參著《教育大辭典》（上海教育出版社）、《實用交際大全》（上海古籍出版社）、《顧準尋思錄》（作家出版社）、《中國現代教育家傳》（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國企業家列傳》（經濟日報出版社）、《中國當代改革者》（光明日報出版社）、《世紀啟示錄》（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國大學校長名

典》（中國人事出版社）等。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一期 2005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一期（2005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